

长时段的回归与历史学的未来

张旭鹏

历史学家是在与时间打交道,他比其他人更具有长时段思维,更擅长应对复杂的变化。一直以来,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打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界限,在后顾与前瞻中查考古今之变,运筹未来之势。但现在,历史学家放弃了这一职责,醉心于探微索隐,在细枝末节和表象上驻足不前。

每当面对危机,历史学家总希望成为时代的预言者,为人类指出一条救世之道;或者成为这纷乱世的行动者,为世界的改变尽一份绵薄之力。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在极具挑战性和开放性的著作《历史学宣言》中,就力图去践行这两种职责。他们一方面提出了一份指引未来历史学家的纲领性宣言,另一方面,他们以开篇和结尾处对《共产党宣言》措辞的模仿,表达了历史学家的一种迫切意愿:面对时代和史学的双重危机,历史学家应当像19世纪的无产者那样,肩负起变革的重任。

在两位作者看来,当今的时代和史学都经受着“短期主义”的困扰。不论是政府管理者、企业决策人,还是学院精

英,甚至历史学家,都普遍缺乏一种看待和思考问题的长远眼光,仅仅满足于近期事务和短期利益。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人们很难把握和解释变动不居的生活世界,特别是在面对未来时,由于缺少对重大问题的长时段考察和反思,人们丧失了应有的洞察力和决断力。从时间向度上来看,长时段的思维方式最终指向未来,而危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两位作者指出,当前人类所面临的最为紧迫也事关其未来生存与福祉的三大问题是:气候变迁、国际治理和社会不平等。由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环境、生态、污染等恶果,似乎正在将人类推向自取灭亡的绝境;不同国家、文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与冲

突,仍然是这个世界战乱频仍的根源;广泛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无论是东西、南北之间,甚或一国之内,正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和谐共存。对于上述问题,因为缺乏长时段的分析方法和着眼于未来的解决之道,人们往往无法获知其确切的发展和走向,只能受困于一种被化约为非此无他的单一论调,难以作出替代性选择。这种对未来的无所适从正是当前时代危机感的根源。

两位作者进而指出,对于危机的梦魇般的想象和关于未来的种种原教旨主义神话的出现,历史学家难咎其责。因为历史学家是在与时间打交道,他比其他人更具有长时段思维,更擅长应对复杂的变化。一直以来,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打

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界限,在后顾与前瞻中查考古今之变,运筹未来之势。但现在,历史学家放弃了这一职责,醉心于探微索隐,在细枝末节和表象上驻足不前。正如作者指出的,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出于各种动机,政治的或学术的,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纷纷转向短期问题。与众不同的个体、莫名其妙的事件和富有深意的历史节点,都成为一时之选。更为严重的是,历史学家也放弃了史学改造社会、资鉴决策者和教化民众的功能,转而退出原本属于自身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将参与权与话语权拱手相让于其他学科的学者。历史学家在大众场域的缺席,让史学愈发成为一门专属于精英的冷僻学问,而缺

少大众对历史的参与和对话,历史学家就难以找到通向未来的其他途径。历史学家所要做的,就是重启长时段议程,在与大众不断展开对话的过程中,借助宏大叙事重塑史学鉴古知今、放眼未来的传统。

当然,用长期思维取代短期思维并不是特别困难,但要真的将长期主义付诸实践却异常艰辛。本书的两位作者之一大卫·阿米蒂奇,不仅是史学重回长时段的倡导者,更是一位身体力行地将长时段应用于研究中的实践者。阿米蒂奇早年师从思想史大家昆廷·斯金纳,专治英国现代早期政治思想,近年来,则提倡从跨区域和跨时间的维度研究思想史。2007

(下转12版) →

← (上接10版)

的南北海陆两大干线的东端贯通了起来,这是一项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伟大事业。正是因为大运河的开通,从此,从长安出发沿黄河而下先达开封,在这里换乘进入运河,可直达钱塘江口杭州,再沿浙江、福建海岸南下,不必冒太大的危险就可以到达广东。中国从此不再是东西交通路线终点的死胡同,而成为世界循环交通路线中的一环。在大运河开始发挥作用的唐代,西方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的目的地不再是单纯的长安或广东,他们来到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扬州,在这里建立起了繁华的居住地,从事商业活动,人数据称有数千人之多。当然,宫崎在强调大运河的世界史意义时,并无意看轻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他认为受大运河影响最大的,不用说是中国自己。

在《东洋的近世》结语中,宫崎再次强调:交通在历史上的意义,不止是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交通不是一种礼仪,而是两个用皮带连接在一起的齿轮,一边转动,另一边也会同时转动。把世界上

的人类看成是同一种有机的生物,这样或许更加恰当。这种生物在世界各处都能扎根,在一处吸收到的养分,可以马上循环到别的地方。在东洋所吸取的养分,结集到了欧洲,在这里成为推动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动力。用长远的历史眼光去看,这个养分一定会再度成为新的活力,渗透到整个世界,这个日子一定会来临。

在具体问题的探讨上,例如,西亚青铜文明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对殷周青铜文化的影响、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铁器文明,对中国“都市国家”的衰微及中央集权的“大领土国家”成长的影响、汉武帝的辽东经营对东方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走向文明的影响,等等。又如,在探讨十字军东征问题时,宫崎花费大量篇幅探讨的是东西方之间的人和物的流动问题:从十一二世纪中国宋王朝时期的国际关系、交通线路,到土耳其塞尔柱王朝的鼎盛;从中国经济的景气、科学技术的发展,到西亚资源的枯竭及普遍存在的银荒;从土耳其人的西迁,到西辽的建立再到蒙古的崛起,等等。而进入

西亚内地的土耳其人,宗教上完全伊斯兰化,当他们前进到小亚细亚并与东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基督教徒发生冲突时,凭借武力上的自信对基督徒发起攻击。长期以来处于平静安眠状态的伊斯兰“圣战”意识被急遽唤醒,而惊恐退缩的东罗马帝国只能以同样的圣战来对抗圣战,向罗马教皇请求援助,从而引发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便是所谓的“十字军东征”。以上提及的所有历史事件,无一不是沿着这条东西交通要道展开的,而且,十字军东征引发的世界历史的种种波动,又大大促进了这条交通线路的发达。宫崎甚至断言,蒙古的兴起,也是土耳其人西迁所引发的波动之一,正是因为十字军东征开辟出来的交通路线,使得蒙古的西征变得更加容易。

四

宫崎市定是东洋史学者,其研究的中心是中国历史。然而,在其等身的成果

中,虽然最基本的内容是对中国历史的思考,但从其最重要的论文集《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这个书名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史学视野至少是亚洲史的;从上文并不完整的介绍中也不难发现,他的史学视野无疑又是世界史的。

在本书上卷《前言》中,就中国上古史的问题,他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基本观点:“我认为,在中国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受到了起源更加悠久的西亚文化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史概论》中,对欧亚大陆铜、铁两种文明的产生与传播路线进行了图解,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史的一些问题作出了解释。在《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中,更是从骑马战术、冶铁技术等许多细节上叙述了西亚文明对中国的影响。

如前所述,在思考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时,宫崎市定时刻将之与世界历史的变动进行关联互动。“秦始皇十四岁即位,即位后十七年灭韩,十九年灭赵,二十二年灭魏,二十四年灭楚,二十五年灭燕,二十六年灭齐,天下归于

一统。这一年为公元前221年。此时,西亚正处于希腊化时期的末期,欧洲正值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击破地中海对岸的迦太基、迦太基的英雄汉尼拔伺机复仇之际。这正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期。”在思考看似纯粹欧洲历史的十字军东征问题时,宫崎是从蒙古草原游牧民族的西迁及宋王朝的社会进步切入的。同样,在思考欧洲文艺复兴、新大陆的发现等问题时,也都是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共通点及互动上展开的。如此一来,中国历史、亚洲历史自然就成了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贯穿宫崎市定中国史、亚洲史、世界史的一根主线,不用说,正是“宫崎史学”中的东西交通视野。

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无法期待宫崎市定一个人就能构建出完整的亚洲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体系来,但他的努力,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今天,面对新一轮“丝绸之路”的研究热潮,宫崎史学的这种学术视野,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